

荣获首届国家图书奖

百花散文书系

现代部分

主编

林呐

徐柏容

郑法清

看
隐

散文
选集。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庐



隐

钱虹编

百花散文书系

现代部分

主编

林呐

柏容

法清

散文选集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编辑例言

一、本套《现代散文丛书》是《百花散文书系》的一个组成部分。选收一九一七至一九四九年间散文家的名篇佳作，按人专集分册。

二、入选的作者均是这一时期的散文名家，所选作品尽可能照顾到作者散文创作的发展脉络。

三、每集作品前均冠以万字以上的评论性序言，简单介绍作者生平，并结合本书所选散文，分析评介其艺术特色及创作发展的道路和影响。

四、所选作品，尽量注明原书发表的出处和时间；对于个别难理解的地方亦加以必要的注释。

序 言

钱 虹

庐隐(1899—1934)，这位五四时期曾与冰心齐名而现在已鲜为人知的女作家，这位第一个加入文学研究会的女会员(她的人会号列于十二名发起人之后)，这位被茅盾先生誉为“‘五四’的产儿”、“觉醒了的的一个女性”，以她那鲜明的创作个性，众多的文学作品，以及独特的艺术风格，在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篇章。

庐隐，本名黄英，1899年生于福建闽侯县(今福州市)一个古板的封建官宦之家，后随家迁居北京。在“可怕的孤独”和“异样的压迫”中度过童年，靠“自己奋斗”才摆脱“童年的厄运”，考进北

京的一所公立高等小学，继而考取该校的师范预科及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后即在北京、安徽等地的中、小学任教。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进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即女师大的前身）国文部继续求学，接受各种新思想的洗礼，并被推为女高师的学生代表，经常参加各种群众性的集会、游行、请愿、演讲等活动。与此同时，开始新文学的创作实践。1921年1月首批加入文学研究会，很快成为活跃在五四文坛的著名女作家之一。1922年毕业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此后在安徽宣城某中学、北平师大附中、福州女子师范学校、上海大夏大学、上海工部局女中等学校度过“口耕生涯”。在十多年执教之余，坚持笔耕不辍，直至临终。她的作品结集出版的有：《海滨故人》（1925）、《曼丽》（1928）、《归雁》（1930）、《灵海潮汐》（1931）、《云鸥情书集》（与李唯建合著，1931）、《玫瑰的刺》（1933）、《女人的心》（1933）、《象牙戒指》（1934）、《庐隐自传》（1934）、《东京小品》（1935）、《火焰》（1936），以及译著《格列佛游记》（1935）等，此外，还有散见于二、三十年代各报刊、杂志上的小说、散文、诗歌、剧本等百余篇。1934年5月

13日，庐隐因难产不幸病逝于上海大华医院14号病室。当时，上海的不少报刊都登载了她的遗影遗墨及各种悼文，痛惜“一代才女”的“英年早逝”，乃中国文坛的“一大损失”。庐隐生前教过的一位女学生，把她的死，比作“好似一盏明灯的熄灭！”

生命的明灯，在燃烧了短短的三十五载之后熄灭了。然而，闪烁在庐隐留下的文学遗产中的才情的火星，至今仍不失其熠熠的光芒。茅盾先生当年就指出，“我们现在读庐隐的全部著作，就仿佛再呼吸着‘五四’时期的空气”（《庐隐论》）。我们今天重读庐隐之作，也深有同感。并且使我们感到有些不平的是，这位以《海滨故人》及其姐妹篇（《或人的悲哀》、《丽石的日记》等等）而蜚声五四文坛的小说家，虽然在散文小品的创作方面也成绩不菲，却始终未能象她的小说那样受到文坛的注意与重视。关于这一点，茅盾先生当年就意识到了，他认为，“庐隐未尝以‘小品文’出名。可是在我看来，她的几篇小品文如《月下的回忆》和《雷峰塔下》似乎比她的小说更好。那篇‘散记’式的《玫瑰的刺》也是清丽可爱的。今年的文坛大有

小品文‘值年’的神气，然而庐隐却在此时死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损失。”（《庐隐论》）在重读了庐隐的全部散文之后，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天假以年的话，庐隐在散文创作方面的艺术成就，当在其小说之上。因为，庐隐的个性与才情，决定了她是一个天生的抒情散文家。

散文与小说属于两种不同的文学体裁，其最根本的区别在于，散文，尤其那些抒情意味较浓的散文（有人称之为小品文），作者的真性情毕现于其文之中，真正是见文如见其人。小说虽也强调作者的真情实感，但作者的好恶爱憎往往隐藏在故事情节、人物形象之后，因此，读者往往很难在小说中看到作者的“自画像”。庐隐是一位感情丰富外露，灵海波涛汹涌，“个性是特别顽强”的敏感女性，正如她自己所剖白的，“我是一个富于感情的人”，“我热就要热到沸点，冷也要冷到冰点”（《云鸥情书集》）。加上她短暂的一生中既充满哀伤又不无浪漫的经历，以及她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所爱所憎，这一切都在她那些以抒情为主要特征的散文中留下了深深的印痕。也许正因为这个缘故，茅盾先生才说：“在小品文中，庐隐

很天真地把她的‘心’给我们看，比我们在她的小说中看她更觉明白。她不掩饰自己的矛盾。（她这种又天真又严肃的态度在她的小说中也是一贯，这是她叫人敬重的一点。）”（《庐隐论》）

忧国忧民的拳拳之心

“庐隐，她是‘五四’的产儿。”

五四运动，这个以反帝反封建为旗帜的爱国运动，不仅开创了中国现代史的新纪元，而且也标志着中国人的灵魂的复苏和觉醒。作为与五四运动“有‘血统’的关系”（茅盾语）的新女性，大学时代的庐隐浑身散发着巨大的爱国热情。她后来在《庐隐自传》中回忆道，“这个时候正是国家的多事之秋，……我整天为奔走国事忙乱着——天安门开民众大会呀，总统府请愿呀，十字路口演讲呀，这些事我是头一遭经历，所以更觉得有兴趣，竟热心到饭都不吃，觉也不睡地干着。”在积极投身各种社会运动的同时，她还与后来成为她丈夫的北京大学学生会代表之一的郭梦良等人经常通信，讨论各种社会问题，由此而阅读了不少

介绍社会主义学说的书。从1920年初至1921年间，庐隐开始在《晨报副刊》、《人道月刊》、《批评半月刊》、《小说月报》等报刊上发表了她的第一批议论性散文——早期杂文。这些早期杂文所议论的范围很广，涉及到妇女解放（《“女子成美会”希望于妇女》）、思想革新（《思想革新的原因》）、新的社会理想与人生价值之实现（《新村底理想与人生底价值》）、改善劳动者悲惨境遇（《劳心者与劳力者》），以及如何创造新文学（《整理旧文学与创造新文学》、《创作的我见》）等等诸方面问题，而这些问题正是当时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热门话题。这些议论性散文，充分表明了庐隐是一位思想敏捷，见解新颖，有着强烈的政治意识、社会责任感和爱国主义激情的女作家，正如她自己所说，“无论是国家，是社会，是世界，是天地万物，都不是与我心没有喜戚关系底”。（《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正因为这样，“五四时期的女作家能够注目在革命性的社会题材的，不能不推庐隐是第一人”（茅盾语），也就毫不奇怪了。

除了上面提到的议论性散文外，庐隐最早发表的记叙性兼抒情性散文，是1922年至1923年

载于《学艺》杂志的一组游记，包括《碧海之滨》、《灵魂的伤痕》、《东游得来的礼物》、《华严泂下》、《海边的谈话》、《离开东京的前一天》、《扶桑印影》等数篇，另一篇载于《小说月报》的《月下的回忆》也属于这组游记之列。1922年春，即将告别大学时代的庐隐与女高师几位同窗好友赴日参观、游览，返国时途经朝鲜及奉天（沈阳）、大连等地，历时一个多月，这组游记式散文即是这一月余所见所闻的随感录。但这组散文除了后来收入《海滨故人》集的《月下的回忆》外，其余数篇极少为人所提及，即便是庐隐本人，在事隔十多年之后，也压根儿忘了这组游记刊于何处（她在《庐隐自传》中提到，大学三年中“有一本《扶桑印影》，就是记载日本参观的一切。可惜被一个朋友拿去弄丢了——而我又无副本”）。因此，这组散文相隔半个多世纪后重新发现，也就弥足珍贵了。这组游记式的散文，行文之散漫，笔致之潇洒都是显而易见的。然而我们今天读到它，仍会为作者在文中所流露的一腔爱国激情而感到心灵的微微颤动。例如《灵魂的伤痕》，作者记叙的是在京都市立高等女学校偶遇一位中国女留学生的事情。起初，她们语言不通

(女留学生说的是日语),无法交流,女留学生急中生智,“忽然蹲在地下,用一块石头子,在土地上写道:‘我是中国厦门人’”后,作者与这位同胞加同乡(作者也是福建人)之间顿时产生了强烈的感情共鸣。通过交谈(也许是同行者中有人懂日语),作者得知她来自台湾,“自幼就看见台湾不幸的民族的苦况”(1895年后台湾沦为日本殖民地——笔者注),虽留学到此,却“不时思念祖国,好象想她的母亲一样”。听了此言,作者浮想联翩,热血沸腾:

……我没有看见台湾人的血,但是我却看见眼前和血一般的杜鹃花了;我没有听见台湾人的悲啼,我却听见天边的孤雁嘹栗的哀鸣了!

呵!人心是肉作的。谁禁得起铁锤打,热炎焚呢?我听见我心血的奔腾了,我感到我鼻管的酸辣了!我也觉得热泪是缘两颊流下来了!

在《扶桑印影》这部“东行漫记”中,既有对日本风景的优美描写,如《风景》那一段落;也有日

本教育的详尽考察；还有对日本风俗、思想界，以及日本鼓吹所谓“中日亲善”的国民外交政策的印象和体会，林林总总，基本保持着客观的写实态度。可是到了朝鲜——这块日本殖民地，即使泛舟美丽的大同江，作者感慨颇深的却是，“被征服的民族，满心除了悲哀还有什么呢？”一踏上中国东北的土地，作者更是抑制不住悲忿的情绪，她看到，“奉天本是中国的领土，而南满铁路沿线廿里的地方都归日本所有了！”大连，这个山清水秀的风景胜地，更是成了日本人推行殖民化的租界地，除了为日本人设立的学校外，连大连公学校也成为彻头彻尾的殖民学校，“教员都是日本人，所教的科目日语最重要，——他们课程表上写日语为国语，中国的国语就叫做汉语”，令作者“心酸血沸”，愤慨不已。并且，这些殖民学校培养出一批批为虎作伥的奴才，与东洋主子狼狈为奸，私开烟馆，暗设妓院，残害中国百姓，把一个美丽的风景胜地搞得乌烟瘴气，难怪作者在结尾处仰天长啸：“苍天总没有话，人仿佛都病着哟！我向那里唤起中国的魂呀！”

以东渡始，以忧国终。庐隐这种忧国之情、爱

国之心，犹如一根扯不断的红丝线，自始至终贯穿于她的散文之中。因而她的散文中，没有严格意义上的记叙性散文，她随时随地都会触景伤情，热泪迸流。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她是一个天生的抒情散文家^①。

忧郁感伤的哀情

庐隐是一个“心里藏不下丝毫渣滓的人”，性格外向，多愁善感，甚至有些狷介执拗。早在五四初期，她就主张，“足称创作的作品，唯一不可缺的就是个性——艺术的结晶，便是主观——个性的情感”（《创作的我见》）。在庐隐的散文中（也包括早期其它作品），她的创作个性表现得最为突出和鲜明的，是她那对黑暗的旧社会的痛恶和与个人生活经历密切相关的忧郁和感伤的情愫。三十年代，就有人把庐隐归为“感伤派女作家”之列^②，大

-
- ① 也有研究者把庐隐称作“抒情的小小说家”，如杨义的《抒情的小小说家——庐隐》（载《新文学论丛》，1982年第3期）等文，可见庐隐的抒情风格在小说中也是一贯的。
- ② 草野：《感伤派女作家黄庐隐》，见《中国现代女作家》一书，北平人文书店，1932年9月版。

概也缘于此。

在收入《海滨故人》集中的《月下的回忆》等早期散文中，已经显露出作者多愁善感的个性特征：月夜登大连的南山，城市的灯光与天上的繁星交相辉映，令人心旷神怡，可是作者一想到白天两个大连小学生把她们称做“支那北京来的”，又听说“大连的孩子谁也不晓得有中华民国”，以及租界地的种种乌烟瘴气，眼前的美景黯然无光，“我寄我的深愁于流水，我将我的苦闷付清光”。这固然表达了作者的忧国之情，也显示出作者心头确实“充满了哀感”，尽管作者后来自称这仅是“一种薄浅的哀感”。那时，作者的努力，是为了“打破人们的迷梦，揭开欢乐的假面具”（《庐隐自传》），因而要将“天灾人祸，相继而来”，“愁云惨雾，弥漫空际”的“社会的悲剧”，用“热烈的同情，沉痛的语言描写出来”，这样“方不负创作家的责任”（《创作的我见》）。因此，五四时期，庐隐的哀感中有着关注社会和忧国忧民的热情。

随着“海滨故人”时代的结束，庐隐的个人生活发生了一连串的变故，“连接着遭遇人间最不幸的死别”。其中，对她的感情生活打击最大的，

是结婚才两载的丈夫郭梦良的突然病故。那篇悼念丈夫的《郭君梦良行状》，字字泪，句句情，凄切哀婉，催人泪下。

在冷酷黑暗的社会，与之相濡以沫的丈夫突然离去的打击，几乎使年轻的庐隐痛不欲生。“所以在这个时期我的作品上，是渲染着更深的感伤”，此后，简直成了“悲哀的叹美者”（《庐隐自传》）。写于这一时期的一系列书信体散文，有《海滨消息——寄波微》、《寄天涯一孤鸿》、《灵海潮汐致梅姊》、《寄梅窠旧主人》、《愁情一缕付征鸿》、《寄燕北故人》、《雷峰塔下——寄到碧落》等等，从这些散文可以看出作者当时满怀的忧郁悲哀无法宣泄，只得通过纸笔，向远方的挚友、甚至九泉之下的亡夫倾诉。

或许是经历了命运的打击和人生的不幸，这一时期作者的作品，虽然忧郁和感伤占了主要成分，但其情感却分明细腻了许多，言词也恳切了许多，不象早年散文那般锋芒毕露，散漫随便，艺术风格渐趋平实自然。如《雷峰塔下——寄到碧落》，这篇写给逝世三周年的亡夫的祭文，比起《郭君梦良行状》来，确实显得亲切委婉多了，文

中追忆了作者与丈夫当年在雷峰塔下游湖、定情、度蜜月的往事，犹如对亡夫（文中以“涵”相称）轻轻地话说家常：“雷峰塔倒了，我们不是很凄然的惋惜吗？不过我绝不曾想到，就在这一年十月里你抛下一切走了，永远的走了！再不想回来了！呵！涵！我从前惋惜雷峰塔的倒塌，现在，呵！现在，我感谢雷峰塔的倒塌，因为它的倒塌，可以扑灭我们的残痕！”

没有泪如雨下的哭喊，没有声嘶力竭的呼唤，絮絮诉说，娓娓道来，却更使人感到情深意笃，酣畅自然。这一时期的书信体散文，除了这篇是写给亡夫的外，其余大部分是写给庐隐的挚友、著名女诗人石评梅（波微、梅姊、颦等）的。石评梅也是一位个人生活遭遇到不幸的女性，她曾是中国共产党的北方区早期领导人之一、高君宇烈士的恋人，但在高生前，却由于她受过有妇之夫的骗而不敢以真心相许，直到高君宇猝然病逝，她才意识到失去了一位真正爱自己的人，悔恨交加，此后常去陶然亭高君宇墓前凭吊、祭扫。正因为她与庐隐都有痛失所爱之人的相似经历，遂引为知己，经常以笔代言，互诉衷肠。作者在致她的书

信体散文中，把自己失去丈夫后的忧伤、悲哀、苦涩和矛盾的情绪渲染得淋漓尽致。在《寄天涯一孤鸿》中，她坦率相告：“我无作则已，有所作必皆凄苦哀凉之音”。在《愁情一缕付征鸿》中，她直言不讳：“我向往想作英雄，——但此念越强，我的哀愁越深，为人类流同情的泪，固然比较一切伟大，不过对于自身的伤痕，不知抚摸惘惜的人，也绝不是英雄”。在另一篇散文《醉后》中，她甚至不加掩饰地提到与波妹（石评梅）拼酒至醉的事，“我们如同疯了一般，一杯，一杯，接连着向唇边送，好象鲸吞鲛饮。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把一小坛子的酒吃光了，可是我还举着杯‘酒来！酒来！’叫个不休！”庐隐和石评梅之间的友情，在一起借酒浇愁、散步谈心、月夜泛舟、陶然亭哭坟中日益深厚，因而1928年9月石评梅突患脑膜炎去世，庐隐在协和医院看着她“咽了那最后的一口气”，其内心的哀伤是不言而喻的。那篇为悼念这位挚友而作的《祭献之辞》，写得如泣如诉，哀婉凄切，“除非地球毁灭，此恨宁有已时！”庐隐的悲情哀绪，至此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